

從政治不正確到政治正確： 波蘭右翼反難民（移民）論述的挑戰*

林政宜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商業智慧學院博士班
觀光與餐旅管理組博士候選人

王孟平

中央警察大學外事警察學系教授

張世強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學博士

摘要

自從1989年共黨統治垮台之後，波蘭曾被視為前東歐共黨集團國家中最為成功的民主轉型和歐洲整合範例；然而，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之後，在「法律與公正黨」（PiS）領銜之下，伴隨著基進的反難民（移民）言論，卻為波蘭點燃前所未見的右翼狂潮，不僅已經成為二戰法西斯主義之後最顯眼的政治現象，也為現代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制度帶來嚴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9年涉外執法政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嗣經修改並增加共同作者後投稿。誠摯感謝研討會評論人移民署移民事務組科長楊翹楚博士的悉心評論和指導。

峻的挑戰。從一個較為廣泛的波蘭脈絡出發，本文將從政治、文化和歷史三個面向，剖析難民危機安全化、基進反難民（移民）論述和今日政治右翼霸權（常被西方主流貼上民粹、民族主義或非自由主義政體的標籤）三者之間的微妙關係。

關鍵詞：不自由民主政體、卡臣斯基、法律與公正黨、難民危機、維謝格拉德集團

* * *

壹、問題意識

「金融危機讓歐洲變成借款國和貸款國，加劇南北差距，現在，難民問題又讓歐洲東西區隔，我們不僅失去團結，更在經歷民族、宗教與人類義務的衝突。」——政治觀察家克拉斯特耶夫（Ivan Krastev）（Andreev 2016）

2019年10月13日，波蘭舉行最新一輪國會大選。繼2015年跌破各方眼鏡一舉拿下國會和總統大選勝利之後，現任執政黨、右翼保守派的「法律與公正黨」（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Law and Justice）雖然在選前身陷各種金融監管弊案和醜聞，從而飽受西方主流媒體口誅筆伐其爭議立場；但喊出「波蘭優先」（Poland First）口號的該黨，依然在「眾議院（下議院）」（Marshal of the Sejm）囊括235席（總席次460席），得票率43.59%，甚至，更超越2015年37.58%得票率。不僅成為波蘭1989年脫離共產主義轉型之後，獲得最多選票支持的國會單一政黨，也繼續在國內站穩執政黨的地位，並一躍而為全歐最受矚目的執政右翼（Santora 2019; Day 2019; Moskwa and Strzelecki 2019）。¹

¹ 「法律與公正黨」在「參議院（上議院）」（Marshal of the Senate）選舉中，也囊括48席（總席次100席），得票率44.56%。「法律與公正黨」在參眾二院同時取得勝選，

面對近年席捲歐陸的右翼政治風潮，二戰後期開始，長期被左翼自由派牢牢壟斷立場的西方主流媒體，不是為它們貼上「極右派」（Far-Right）、「民粹主義」（Populism）或「反民主」（Anti-Democracy）的負面標籤，暗示其背後狂熱、偏狹、集權和非理性本質，就是乾脆直接打上「新納粹」（Neo-Nazi）或「種族主義」（Racism）妖魔化印記。囿於二戰「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歷史傷痕和陰影，西方主流媒體始終不願正視和省思，晚近右翼復興的真正背景和原因。同樣，由於一再忽視波蘭特殊發展經歷和文化傳承的結果，也使得西方主流媒體始終無法理解，為何被貼上極多負面標籤的「法律與公正黨」能夠一再擄獲波蘭人心！

職是之故，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Refugee Crisis）爆發初期，當西方主流媒體不斷頌揚德國「開放文化」（Willkommenskultur）精神彰顯歐盟開放邊界（Open Border）和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價值、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的「歡迎難民」（Refugees Welcome）樹立表率之際，它們無法理解，為何很快地歐洲各國便出現反難民的逆襲浪潮，不光是在「難民之路」（Refugee Route）沿途經過的國家，即便是最先擁抱難民的德國，也出現前所未見的反對聲浪和政治運動。直接或間接地，帶動原本早已被邊緣化的歐洲各國右翼政黨重回政治舞台中央。

毫無疑問，在這波反難民和右翼勢力復振的浪潮中，波蘭佔據一個最為突出的角色，也是西方主流媒體批判最力的對象。波蘭作為歐盟（European Union, EU）之中最大的東歐國家，²不僅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成員國和2004年歐盟東擴要角。同時，也是前

壓倒主要競選對手「市民陣線」（Koalicja Obywatelska, KO/Civic Coalition）。「市民陣線」此次選舉在眾議院取得134席，得票率27.4%；參議院取得43席，得票率35.66%（儘管，「市民陣線」宣稱將會聯合其他反對派議員跨越51席過半門檻）（Henley and Davies 2019; Morris 2019）。「市民陣線」乃係波蘭最重要的反對黨「公民綱領黨」從2018年地方選舉開始領銜組建之中間派選舉聯盟，主要成員包括：「現代黨」（Modern）、「波蘭倡議」（Polish Initiative）和「綠黨」（The Greens）。

² 從傳統地理意義上的東歐來說，波蘭國民生產總值（GDP）居冠（全歐排行第八），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皆僅次於烏克蘭，位居第二；但若係以歐盟內部的東歐國家排名，波蘭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皆為第一。

華沙公約（Warsaw Pact）集團國家的民主轉型典範；但出乎各方意料之外，在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之際，卻搖身一變成爲反難民論述的急先鋒，爲東歐「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 V4）樹立鮮明的反難民旗幟。³彼時，「法律和公正黨」主席卡臣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甚至公然宣稱：「難民是危險疾病、寄生蟲和原動物。」（Cienski 2015; Strzałkowski 2018）同時，「法律和公正黨」也訴求「零移民、零難民、零恐攻」（Styczyńska 2018），並拒絕配合歐盟推動的強制性難民安置配額計畫（Quotas Plan）（Frelak 2017; Tilles 2018）。⁴

種種尖銳的爭議性反難民言論和作爲，雖然被西方主流媒體視爲觸犯「政治不正確」（Political Incorrectness）的敏感禁忌；但若從彼時波蘭國內充斥高漲的「伊斯蘭恐慌」（Islamophobia）氛圍觀察，「法律和公正黨」所主打的反難民路線，毋寧才是一種真正體察波蘭民情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論述。⁵同時，也是一種極爲高明的選戰策略，一路將該黨推向迄今屹立不搖的執政地位。⁶

真正值得探問的是，爲何曾經經歷多年共產左派統治的波蘭，今日竟然搖身一變成爲全歐右翼政治勢力的領頭羊？爲何曾在1990年代接納數萬伊斯蘭車臣難民的波蘭，今日卻因尚未湧入的穆斯林難民而出現公眾恐慌，從而，催

³ 「維謝格拉德集團」係指1991年由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共組的東歐國家聯盟。

⁴ 儘管早在《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簽署之際，歐盟各國便已致力推動建立共同移民政策，但會員國間始終未能達成共識。2015年難民危機，一方面，雖然凸顯歐盟缺乏共同移民政策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卻加深各國對於共同移民政策的分歧立場。

⁵ 儘管在不同時期和領域中，存在不同的內涵和用法，但「政治正確」一詞，最常見於今日歐美「文化戰爭」（Culture War）。歐洲右派經常引此一辭彙批判左派（美國保守派批評自由派）挾著「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風潮和媒體輿論的力量，不斷「無限上綱」他們在種族（例如：少數保障）、性別（例如：多元性別）、宗教（例如：宗教自由）、人權（例如：普世價值），甚至全球暖化（例如：節能減碳）等等論題上的論述霸權，要求反對者或異議者「噤聲」，宛如一種在公共輿論中的「霸凌」；至於，所謂的「政治不正確」，就是各種挑戰上述話語霸權的言論、行動或政策。

⁶ 「法律與公正黨」曾經三度執政，分別爲：2005年至2007年（位居少數政府，地位不穩而提前垮台）、2015年至2019年，以及2019年國會選舉之後展開的任期。

生激烈的反難民（移民）言論和立場並擁護「法律和公正黨」的登台執政？究竟，這是右翼政黨操弄的結果（一如西方主流媒體宣傳的論調），還是有其更為盤根錯節的社會脈絡或結構性因素？本文認為，若欲理解上述令人困惑的問題，分析今日「法律和公正黨」登台與其反難民（移民）論述在波蘭取得正當性基礎的原因，便須考察波蘭在後冷戰時期所經歷的特殊轉型經驗，以及2015年難民危機前後移民論述「安全化」（Secularization）的重要發展。

基此，在下文的討論中，首先，本文將分從民主變革、宗教文化和歷史記憶三個面向，剖析1989年轉型之後波蘭的特殊發展經驗，以及其如何為晚近波蘭右翼勢力孕生的有利發展土壤；其次，透過回顧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對於波蘭國內政治的衝擊，本文也將進一步分析，「法律和公正黨」如何得益於彼時難民（移民）論述「安全化」的發展方向；再者，本文則將從今日波蘭相關移民需求和實際現況出發，嘗試指出存在於反難民（移民）論述背後的弔詭；最後，在代結語部分，本文將從近期重要的政治爭議出發，反省今日在右翼政府主導之下的波蘭，究竟是一種西方眼中的「不自由民主政體」（Illiberal Democracy）？或是另一種「東歐式典範」的「新」政治選擇？本文認為，作為一個歐洲右翼政治的標竿，透過波蘭實際例證的討論，不僅有助釐清今日歐洲難民危機背後的政治效應，也有助於理解晚近歐洲政治右轉的現象，以及波蘭政治發展傳達出的重要意義。

貳、波蘭政治右傾的特殊脈絡

爲了要從更廣泛的脈絡理解政治右翼在波蘭孕生的背景，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面向進行討論：一、波蘭民主轉型經驗遺產；二、波蘭天主教社會文化傳統；三、「圍困」的集體歷史記憶。

一、波蘭民主轉型經驗遺產

1989年，在「團結工聯（團結工會）」（Solidarność/Solidarity）領導

之下，波蘭正式完成民主轉型。⁷彼時，掌握新政權的自由派菁英，深受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吸引，爲了迅速振興波蘭經濟並接軌歐洲，並擺脫共產主義計畫經濟的框架，決定採取知名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實施全面的價格、外貿、匯率全面自由化（陳平 2019）；但在經濟體質衰弱的情況之下，貿然實施全面自由化的結果，卻帶來巨額貿易逆差、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企業倒閉和大量失業。西方商品湧入搶占市場，波蘭優勢產品（例如：農業和工業產品）卻無法打入西方市場。本地企業紛紛倒閉，跨國資本順勢廉價抄底，積累多年的國家資本迅速流失，導致房產泡沫和物價飆漲，間接造成人口外移、經濟蕭條、貧富分化和青年低生育率；此外，向「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請求貸款援助的結果，也使得波蘭緊縮財政預算、削減社會福利和出售國有資產，導致經濟十年不振（儘管，後來歐美國家出於地緣政治考量，免除部份波蘭外債）（陳平 2019）。

當「休克療法」未能迅速矯正國內困局之際，很多人開始便把矛頭指向擔任政府要職的自由派菁英和共黨遺老，質疑二者合謀勾結、弊端重重，在國營企業私有化過程中聯手瓜分。波蘭人普遍認爲，過去，他們是政治上的奴隸；現在，他們是經濟上的奴隸（陳平 2019）。對於民主轉型與經濟自由化的不滿，重疊政治上的不滿，也爲波蘭政治右轉提供溫床。「法律與公正黨」正是崛起於此種社會氛圍之中。

波蘭爭取轉型階段，很多自由派政治菁英皆統一在「團結工聯」旗幟之下。成功轉型之後，便各自投入不同路線的政黨競爭。卡臣斯基與他的學生胞

⁷ 1980年，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華勒沙（Lech Wałęsa）爲首的「團結工聯（團結工會）」創立，成爲當時華沙公約會員國中，唯一非由共黨掌控的工會。1989年2月，「波蘭統一工人黨（波蘭共產黨）」（Polska Zjednoczona Partia Robotnicza, PZPR/Polish United Workers' Party, PUWP）和「團結工聯」舉行「圓桌會議」（Okrągły Stół/Round Table），達成多項重要的體制改革和轉型協議。同年6月，「團結工聯」取得國會改選勝利。同年年底，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共黨專政地位，改國名爲「波蘭共和國（波蘭）」（Rzeczpospolita Polska/Republic of Poland）。1990年1月華勒沙也在同年年底的總統大選中，順利當選波蘭首任民選總統。至此，波蘭正式完成民主化的制度轉型過程（Davies 2016）。

弟克承司奇（Lech Kaczyński）於1990年5月結合團結工會內部激進和反對勢力另組政黨「中間協定」（Porozumienie Centrum, PC/Centre Agreement），⁸強力批判執政黨的經濟改革和修憲工程（前者，被認為是波蘭經濟困頓的主因；後者，則被批評為企圖否定天主教的公共地位和份量，根本是世俗主義的自由派與無神論共產主義的合謀），無論是「民主左翼聯盟」（Sojusz Lewicy Demokratycznej, SLD/Democratic Left Alliance）或「團結工聯」都被視為是一種「親共自由派共犯結構」（Davies 2016）。卡臣斯基與克承司奇二人，成功讓很多知識菁英和民衆相信，自由民主政體與共產專制根本只是一丘之貉，背後只是無神論菁英的意志和利益交換。

2001年，在先前「中間協定」打下的政治基礎之上，卡氏兄弟二人進一步創建「法律與公正黨」，並於2005年首次投入國會大選、拿下最多席次，得以籌組少數政府。自此，在後「團結工聯」時代之下，正式拉開「法律與公正黨」對抗「市民綱領黨」（Platforma Obywatelska, PO/Civic Platform）的二黨政治序幕。相較於「市民綱領黨」期待建立一個「新波蘭」（New Poland），並崇尚西方「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的經濟、文化與憲政模式；被視為保守派政黨的「法律與公正黨」也為「市民綱領黨」（還有「民主左翼聯盟」等其它左翼政黨）貼上「親共自由派」菁英的標籤，並充分結合宗教、民族和愛國元素，利用波蘭長期遭受外國欺壓的歷史背景，以及轉型後期對於自由市場累積的懷疑與敵意，成功吸引許多右翼小黨、天主教媒體和青年側翼的擁護。

二、波蘭天主教社會文化傳統

任何對於波蘭社會稍有理解的人都知道，天主教和天主教會，始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自古以來，波蘭便自詡為是基督教文化抵禦東方入侵的「基督教王國堡壘」（Antemurale Christianitatis/Bulwark of Christendom）。

⁸ 克承司奇曾擔任波蘭總統，但2010年因為飛機墜毀俄國而身亡（後述）。孿生兄弟二人曾為電影童星，在《偷月亮的雙胞胎》（*The Two Who Stole The Moon*）中擔綱演出。

陪伴波蘭人渡過每一個艱難困厄歷史時期的天主教信仰傳統，也早已成爲界定「波蘭魂」（Polishness）認同的核心（Styczyńska 2018）。⁹波蘭也因此被稱爲「羅馬天主教的波蘭」（Roman Catholic Poland）（Erlanger and Santora 2018）。2015年7月24日（時值朝聖節慶高峰），「法律與公正黨」領袖卡臣斯基也曾在波蘭最崇高的天主教「黑聖母」朝聖地「光明山」（Jasna Góra）公開指出：「除了天主教會之外，波蘭沒有其它道德訓示，即便有人懷疑或沒有信仰，但作爲一位波蘭的愛國者，他都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從古至今，沒有天主教會，就沒有波蘭。」（Borowik 2017）。¹⁰

共黨統治時期，天主教會雖然無法針對公共事務發言，但天主教信仰卻在私領域成爲凝聚波蘭人認同的樞紐。從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St. John Paul II）在波蘭轉型前後發揮的關鍵作用，便不難看出天主教對於波蘭的深刻影響；事實上，即便進入轉型後期，天主教會依然具有強大的公共事務發言權（例如：教會影響力得以進入學校教育、實施嚴格墮胎法律、與教廷建立特殊政教協定、取回許多在共產時期被徵收的財產、存在天主教色彩濃厚的媒體規範等），教會高層也經常以訓示口吻針對重大政治和社會議題表達立場（Borowik 2017）。

就像當年「團結工聯」成功地利用天主教信仰作爲樞紐，形塑「良善的天主教波蘭人」與「邪惡的無神論共產黨」之間的強烈對比，號召不同領域和階級的波蘭人民團結行動。今天，以「法律和公正黨」爲首的波蘭右翼勢力，也巧妙地結合波蘭認同中的天主教元素，爲其反對者貼上「親共自由派」菁英的標籤，並批評他們不斷以民主、自由和人權等等「政治正確」的西方主

⁹ 最近波蘭新護照封面正式加註以下字樣「上帝、榮耀、祖國」（Bóg/God, Honor/Honor, Ojczyzna/Motherland）這句傳統波蘭軍隊的格言；儘管，引發自由派人士的批評，但支持者卻認爲此舉方能充分體現波蘭認同的精神（Woźnicki 2019）。

¹⁰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之前，波蘭境內其實存在許多民族（包括：波蘭人、猶太人、德國人、烏克蘭人、立陶宛人、亞美尼亞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但大屠殺和戰後邊界挪移的結果，波蘭卻轉而變成一個族裔同質性極高的國家（由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波蘭人佔據人口結構中的絕大多數）。後來，共黨統治隔絕外界交流的歷史，也加深波蘭社會對於外來文化的距離。統計結果顯示，許多波蘭民衆根本沒有真正接觸外國人的經驗。此一特殊社會背景，也成爲右翼反難民論調能夠孕生於波蘭社會中的重要基石（Frelak 2017; Styczyńska 2018）。

流價值觀念，企圖為「世俗主義」和「多元文化論」意識形態「暗度陳倉」（Erlanger and Santora 2018）：¹¹一方面，希望藉此削弱波蘭傳統天主教信仰和文化；另一方面，為其背後的西方世俗利益集團服務。基此，看在波蘭右翼勢力眼中，今天浮上檯面的難民危機背後，其實根本不是什麼法律和人權問題，而是「親共自由派」再一次利用「政治正確」價值綁架波蘭的企圖。¹²

對於波蘭右翼陣營來說，過於世俗、自由和多元的發展趨勢，毋寧才是今日導致歐洲喪失凝聚力、族群隔離和爆發恐怖攻擊的根源。「法律與公正黨」政府前外長瓦茨克瓦斯基（Witold Waszczykowski）便曾在德國《圖片報》（Bild）專訪中，針對西方主流價值觀諷刺地指出：「我的政府希望矯正我們國家的一些弊病，像是文化和種族混雜、一個充斥單車和素食主義者的世界、還有那些只會使用再生能源並企圖對抗所有宗教象徵的人們、、、真正能夠打動大多數波蘭人的，是傳統、歷史、愛國、還有對於天主的信仰，以及一個存在男女之間的正常家庭。」（Davies 2016）基本上，短短一段言論，可以說就已經全幅重擊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

由此觀之，今天歐洲各國真正的當務之急，並不是要收容無法相容和同化的難民（特別是文化相異的穆斯林），而是應該要恢復傳統歐洲價值「拉丁文明和西方普世主義」（Latin Civilization and Western Universalism），重新「再基督教化」（Re-Christianization）（Styczyńska 2018; Santora 2019）。真正需要歐洲各國伸出援手的對象，應該是分享共同基督教文化的難民（例如：共同分享斯拉夫（Slavic）文化和東正教（Orthodox）傳統的立陶宛、白俄羅斯、塞爾維亞或烏克蘭）。

¹¹ 經歷二戰和共產統治的波蘭，始終對於「世俗主義」心懷存疑，因為，無論是「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都被其視為是現代世俗意識形態帶來的惡果。

¹² 波蘭批評，西方的「政治正確」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武器，始終存在雙重標準。例如：當今天西方批評波蘭缺乏人道精神，刻意將難民界定為經濟移民或非法移民時，很多評論家都忘記了，早在1990年代東歐劇變之際，大批湧入西歐國家尋求的東歐難民，當時，也曾被稱作「偽裝的經濟難民」（Disguised Economic Migrants）（Cohen 2006）。

三、「圍困」的集體歷史記憶

從18世紀開始，俄普奧三次瓜分、拿破崙入侵、二戰德國占領，再到蘇聯接收成立共產政權。¹³回顧歷史，波蘭不僅是列強交戰的舞台，也是鄰國覬覦和瓜分的對象。在此種氛圍之下，波蘭人的集體歷史記憶中，始終烙印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圍困」（Under Siege）之感。波蘭人無法信任何鄰國，也非常擔心遭到內部叛徒出賣。一種「內神外鬼」的「陰謀論」，始終在公共論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今日穆斯林難民問題也被視為一種世俗自由派菁英與跨國資本陰謀分化波蘭的伎倆）（Davies 2016; Applebaum 2018）。¹⁴

不斷受到外國勢力瓜分、入侵和占領的歷史，再加上轉型初期遭到跨國資本無情掠奪的慘痛經驗，也充分體現在波蘭對待歐盟的矛盾態度之上。在2004年加入歐盟之後，波蘭便非常仰賴「歐洲基金」（European Funds）挹注（特別是公共投資部門）（Erlanger and Santora 2018）；但在政治右翼不斷渲染「圍困」陰影的籠罩之下，波蘭國內也一直存在為數不小的疑歐派（Euroscpticism）或反歐派（Anti-European）。一方面，他們擔心「拿人手短」，淪為外國資本掌控的對象；另一方面，他們也大力批判，歐盟政策以法國和德國為考量核心，包括波蘭在內的歐盟東歐後進會員國，往往被邊緣化為「二等公民」（Zerofsky 2018; Styczyńska 2018; Erlanger and Santora 2018）。

¹³ 越來越多的歷史研究資料顯示，波蘭在二戰前後遭遇的苦難絕不亞於猶太人（戰時，因為不願配合成立傀儡政權，波蘭人民遭到納粹屠殺；戰後，在蘇聯接受過程中，許多知識份子和民族獨立人士也遭到強力肅清（Zerofsky 2018）

¹⁴ 一個最能貼切說明這種集體情感的戲劇性事件，莫過於發生於2010年時任波蘭總統克承司奇（「法律與公正黨」領袖卡巴斯基學生胞弟）墜機意外。2010年4月10日，原本預定搭機前往俄國紀念「卡廷大屠殺」（Katyn Massacres）（事件發生於1940年蘇軍入侵波蘭期間，當時蘇聯秘密警察屠殺超過2萬多名波蘭戰俘、公職人員和知識菁英。日後，此一事件也一再觸動波蘭與俄羅斯二國雙邊關係）的克承司奇伉儷與多位黨政高層，在飛行途中遭遇濃霧而失事墜毀，機上96名乘客全數罹難（Davies 2016）。原本，飽受多起爭議事件糾纏，總統克承司奇連任之途，似乎顯得困難重重；但「法律與公正黨」卻利用此一事件後續效應重拾部分政治聲望。畢竟，相隔70年後，波蘭菁英再度亡命於俄國森林之中。當中的巧合，極易營造一種苦難命運循環的印象。「法律與公正黨」也進一步利用波蘭民衆的「圍困」心理，趁機將「親共自由派」政敵視為意外事件背後的陰謀推手（Zerofsky 2018），如同歷史上不斷勾結外部勢力和出賣波蘭的民族叛徒。

從以上三個面向的討論中，不難看出，正是由於此種特殊的政治遺產、信仰文化和集體心理，得以孕生波蘭迄今不墜的右翼政治風潮，以及其完全顛覆西方主流「政治正確」思維的反難民（移民）論述。

參、2015年難民危機與反移民問題安全化

隨著北非和中東政治局勢的惡化，2015年前後，上百萬難民湧入歐洲大陸（Eurostat 2016）。難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難民之路」的悲慘景象，頓時佔據各大西方主流媒體的目光；然而，正當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各國商議如何實施人道救援行動之際，波蘭領銜的東歐「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卻口徑一致擺出反對難民入境的立場，擔心大批難民湧入，將會形成嚴重的安全威脅，帶來社會動亂和恐怖主義。

弔詭的是，在難民危機中，僅有匈牙利實際上出現短期難民現象，但「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卻皆出現反難民風潮。像是波蘭，則是更為突兀的例證，因為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前後，根本沒有任何一位難民入境波蘭，但波蘭始終對於難民問題採取高調反對立場，即便難民危機風潮已然暫告消退的今天，仍然主宰波蘭國內政治氛圍。

事實上，難民危機初期，波蘭社會尚未顯露強烈的反對立場（Frelak 2017; Styczyńska 2018），甚至，不乏投入海外救援行動的民間組織（NGOs）和部分媒體的友善言論（Frelak 2017），但很快就被鋪天蓋地的反難民論調淹沒。2015年同時舉行的國會和總統選舉，更是反難民論調推波助瀾的重要事件。「法律與公正黨」和其它右翼政黨和團體，¹⁵則在輿論形塑過程中扮演極

¹⁵ 除了與「法律與公正黨」在選戰中結盟的「團結波蘭」（Solidarna Polska, SP/Solidary Poland）、「波蘭一起」（Polska Razem, PR/Poland Together）和「共和國右翼」（Prawica Rzeczypospolitej/Right Wing of the Republic）之外，彼時在反難民論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黨和團體，還包括：極右翼的「全國激進陣線」（Obóz Narodowo-Radykalny, ONR/The National Radical Camp）（承襲二戰前期法西斯思想，具有民族主義、反共、反猶太色彩，訴求族群同質性）、「民族運動」（Ruch Narodowy, RN/National Movement）、「全波蘭青年」（Młodzież Wszechpolska/All-Polish Youth）（屬於青年組織，主張天主教民族主義、反西方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新右翼國會」（自稱是波蘭最堅定的反歐盟政黨）和「酷其茲15」（Kukiz'15）（拒絕接受交戰區難民、批評歐盟官僚、鬆綁歐盟法律）等等。

為關鍵的角色。在「不歡迎難民」的主要基調之下，一方面，它們訴求外來移民（特別是穆斯林）可能侵蝕文化認同；另一方面，它們則將焦點轉移到經濟與安全，認為移民可能搶奪就業機會、侵蝕社會福利並帶來恐怖主義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右翼政黨和團體都傾向用「移民」（Immigrant）、「伊斯蘭移民」（Islamic Immigrant）或「經濟移民」（Economic Migrant）等等詞彙，取代「難民」（Refugee）一詞，希望公眾將焦點擺在移民背後的經濟因素（特別是來自北非和中東的入境者），而非移民背後所遭遇的政治、經濟或戰爭迫害。像是「民族運動」領袖維尼奇（Robert Winnicki），便曾宣稱穆斯林難民為「入侵者」（Invaders）。右翼認為，波蘭無力承擔難民，歐盟補助也杯水車薪。彼時「新右翼國會」（Kongres Nowej Prawicy, KNP/Congress of the New Right）在「歐洲議會」的波蘭代表柯恩米奇（Janusz Korwin-Mikke）也曾在議會辯論中不斷強調，若非歐洲提供優待，一個難民也不會來。如果難民不想工作，歐洲就不應該給予援助。否則，難民收容就像集中營，導致很多不工作的「人類垃圾」（Human Garbage）進入歐洲，最終帶來歐洲的墮落（Styczyńska 2018）。

作為彼時最大的反對黨，「法律與公正黨」無疑是當時反難民論述發酵之下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在2015年國會與總統選戰中，「法律與公正黨」靠著主打「波蘭人的波蘭」（Poland for Poles），成功將自身塑造為唯一有能力抵禦外敵穆斯林的力量，取得空前的政治勝利（Santora 2019），而在上台之後，「法律與公正黨」首先面臨的第一項挑戰，也就是歐盟主導的強制性難民安置配額計畫。

為了解決彼時的難民危機，在收容最多難民的德國主導之下，歐盟各國內政部長會議罕見地以多數決投票方式強行通過強制性難民安置配額計畫（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捷克投票反對；芬蘭棄權，英國不參加）。¹⁶當

¹⁶ 配額計畫商議期間，並未具體明確說明歐盟會員國未履行之制裁方式。事實上，「維謝格拉德集團」國家都拒絕執行。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甚至對此提出訴訟（2017年9月敗訴）。荷蘭、瑞典、德國則要求以歐盟預算配套作為執行配額計畫前提。2017年12月，「歐盟執委會」決定對拒絕執行的匈牙利、捷克、波蘭提出告訴（BBC 2015；Steenland 2018）。

時，波蘭的執政黨「公民綱領黨」，原本受迫於國內政治氣氛，不願接受此一方案；但在歐盟祭出經濟制裁壓力和各國居中協調之下，最終決定接受7,000名難民配額；然而，此舉一出，頓時成爲右翼選戰的箭靶。「法律與公正黨」不僅批評「公民綱領黨」背棄「維謝格拉德集團」，密謀勾結德法菁英，也無視於難民入境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¹⁷

但非常諷刺的是，雖然得益於批判配額計畫而登台，但「法律與公正黨」在剛剛上台伊始，卻希望維持前任「公民綱領黨」政府的立場，繼續推動歐盟配額計畫；直到2015年底和2016年初，布魯塞爾和巴黎分別爆發恐怖攻擊事件，¹⁸「法律與公正黨」才轉而重拾強硬反對立場，明確宣布拒絕執行配額計畫，進而推動一系列緊縮國境管理的措施（例如：在2016年6月間通過備受爭議的《反恐法》。著名「人權觀察」（Human Right Watch）組織批評該法，在缺乏有效司法監督的情況之下，授予波蘭內部安全機構（Internal Security Agency）、國境警察（Border Guard）和警察過於浮濫的權力，無論是鬆綁非經法院程序監督和拘禁外國人的權力、授予採集指紋、面部辨識、生物資訊（DNA）的權力、放寬封鎖網站和非法取證門檻，以及日益繁瑣的國境查察程序，並排除難民針對不利程序尋求司法救濟的機會（Panoptikon Foundation 2016; Frelak 2017; Human Right Watch 2017）。

「法律與公正黨」新政府總理席多（Beata Szydło）對外明確地表示，配額計畫只會吸引更多難民，而非危機的解決分案。彼時也是波蘭擔任「維謝格拉德集團」輪值主席期間。波蘭也代表「維謝格拉德集團」表示，該集團四國政府將致力於保護歐盟邊界，從「境外」徹底解決難民危機的真正根源，反對任何可能侵害會員國難民解決能力的強制性配額計畫（Frelak 2017）。¹⁹儘管，面對波蘭突然的立場轉向，西方主流媒體莫不強力撻伐，爲其貼上「反

¹⁷ 針對配額計畫不敢明確表態的左翼政黨，也同樣在2015年國會大選中遭逢重挫。

¹⁸ 2015年11月13日，在法國首都巴黎，爆發嚴重恐怖攻擊事件；2016年3月22日，在比利時首都和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出現連環爆炸恐怖襲擊事件；伊斯蘭國在事發後宣布對此事負責。二起事件，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IS）皆出面宣稱主使。

¹⁹ 「法律與公正黨」新政府認爲，真正的難民解決方案，應該著眼於戰亂發生地，從「境外（或源頭）」阻擋難民湧入歐洲，而非一直糾結於「境內」解決方案。

人道」、「歧視」和「意識形態」的標籤，但依舊無法撼動「法律與公正黨」的堅定立場。「法律與公正黨」政府內政首長史奇巴（Jakub Skiba）清楚指出：「這是一個務實立場，而非意識形態。在我們看來，根據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吸納大量難民的作法才是意識形態，才是不正確的！」（Frelak 2017）；除此之外，面對歐盟可能的制裁行動，波蘭國會也在2016年10月通過一項決議，指控強制性配額計畫違反《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第5條的「輔助性原則」（Principles of Subsidiarity）。²⁰

儘管，達成「歐盟土耳其協議」（EU-Turkey Deal）之後，²¹難民問題暫時獲得緩解，再加上「英國脫歐」（Brexit）紛擾開始搶佔新聞版面，喧鬧一時的難民危機似乎逐漸移出各國主流媒體的目光焦點，但波蘭卻並非如此。2015年前後，難民危機與選戰競爭留下的話語元素，依然繼續在日後的波蘭政治中位居樞紐，並為右翼政治的茁壯發展添薪加柴。

許多民調結果充分顯示，在波蘭公共輿論中，難民（或移民）問題已被高度「安全化」。對於多數波蘭民眾來說，難民（或移民）根本不是「人道主義」或「普世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安全」問題（Pew Research Center 2016）；²²但難解之處便在於，此種「安全」問題的涵蓋範疇，不光是經濟發展、福利體制或恐怖攻擊，在右翼政黨的形塑之下，還牽涉複雜的身份與文化認同問題，交雜對於伊斯蘭文化入侵的恐懼（Cichocki and Jabkowski 2019; Demos 2017）。²³在此種意義之下，不斷妖魔化和恐懼動員的結果，難

²⁰ 「輔助性原則」意指，唯有在各會員國政策行動不夠充分的情況之下，歐盟才能以輔助性的角色介入強制。從波蘭的立場而言，由於認為本國具有自主和完整的難民政策因應能力，因此，歐盟並沒有介入實施強制性配額計畫的空間。

²¹ 在2016年3月20日達成的「歐盟土耳其協議」中，土耳其承諾將配合進行歐盟難民遣返和安置，換取歐盟給予簽證優惠和金援（BBC 2016）。嚴格來說，協議簽訂之後，土耳其雖然形同歐盟阻擋難民湧入的地理屏障，但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因為土耳其雖然可以阻擋「巴爾幹之路」的難民，但卻無法阻擋「地中海之路」的難民，像是海岸線綿延的義大利，仍然高喊要求歐盟必須提出整體性的共同解決方案，而土耳其也經常以其重要屏障地位作為與歐盟談判的政治籌碼。

²²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預期青年世代較具親歐色彩和文化接納程度，但相較於其他歐洲各國，波蘭青年世代反而是反難民最力的群體（Frelak 2017）。

²³ 事實上，早在難民危機爆發之前，伴隨歐陸不斷發生的恐怖攻擊事件，波蘭社會便早已瀰漫「伊斯蘭威脅論」。在選舉的推波助瀾之下，此種論調更激化進一步地對立。

民（或移民）問題儼然已經被上綱為一種波蘭版本的「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對立、甚至戰爭。不僅標示「伊斯蘭威脅」與「波蘭天主教認同」之間的對抗，也標示著「（無神論）世俗主義」和「（有神論）宗教傳統」之間的傾軋，還標示著「多元文化論」與「絕對信仰價值」之間的衝突，更標示著「歐洲統合主義」與「波蘭獨立地位」之間的拉鋸。

然而，令人不禁好奇的是，為何曾在1990年代接納數萬伊斯蘭車臣難民的波蘭，今日卻因尚未湧入的穆斯林難民而出現公眾恐慌？為何境內穆斯林尚不及總人口0.1%的波蘭（Narkowicz and Pedziwiatr 2017），竟如此恐懼穆斯林難民的安全威脅？右派口中的文化「差異」和「威脅」真的是波蘭反對和敵視穆斯林難民的唯一原因嗎？堅定拒絕穆斯林難民入境的同時，面對國內經濟嚴重的勞動力缺口問題，迄今依然高舉反難民（移民）大旗的「法律與公正黨」政府，又將如何予以回應呢？以下，本文便將對此進行討論。

肆、波蘭現況與反難民（移民）論述之虛實

經歷艱難的轉型陣痛期之後，近年，波蘭經濟開始迅速發展，不僅國民生產總值（GDP）傲視歐盟，²⁴失業率也大幅下降；然而，很多勞動部門卻陷入缺工危機，許多企業雇主都在努力尋找勞力，遊說政府開放更多外籍勞工。缺工加上要求提升工作條件的罷工活動，導致波蘭勞動工資逐步攀升，從而使得外國資本開始卻步。在此發展趨勢之下，除非能夠成功進行產業升級和分工調整，否則，當前波蘭仰賴的低工資發展模式勢將面臨難解的困境。嚴格來說，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能夠透過提升社會福利待遇爭取選票，毋寧也是得益於近年經濟增長的果實（Tilles 2018; Steenland 2018）；但勞動力匱乏之後的

「華沙大學偏見研究中心」（Warsaw University's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ejudice）的研究結果指出，從2013年至2016年之間，波蘭國內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便已增加三倍；但「法律與公正黨」上台之後，2016年反而選解散內政部轄下的「預防種族歧視、排外和不寬容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Preven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Intolerance），使得西方主流媒體更為憂慮波蘭境內少數族裔的地位（Kelly and Pawlak 2018）。

²⁴ 2018年，波蘭國民生產總值（GDP）成長為5.1%，傲視歐盟各國（除了馬爾他與愛爾蘭）（Harper 2019a）。

經濟榮景究竟還能維繫多久？右翼政黨的反難民（移民）論述，是否將阻礙波蘭向外吸納勞動力？抑或，除了從外引入勞動力，波蘭還有其它的解決方案？

儘管，波蘭擁有與德國相仿的國土面積，但波蘭的人口比例，卻遠不及德國的二分之一；事實上，波蘭乃是一個人口外移（Emigration）問題嚴重的國家。1990年代轉型後期的經濟蕭條，促使很多波蘭民衆不惜以非法移民身份，入境其它西歐國家追求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條件。2004年加入歐盟之後，得益於邊界門戶開放，波蘭再度出現海外移居熱潮；及至今日，儘管波蘭國內經濟情況已有大幅改善，但對於很多波蘭民衆來說（特別是技術性人才），仍然非常嚮往前往海外追求更好的環境。大量波蘭海外移民的出現，雖然可為本國帶來不少的僑匯收益，但似乎仍比不上人才與技術流失的代價；更為嚴峻的挑戰則是，轉型後期的經濟蕭條，不僅造就勞動力外流，也造成青少年不敢生育的結果。因此，今日波蘭勞動力缺口的形成，可以說乃是「人口外移、少子化和高齡化」的綜合結果（Steenland 2018）。

然而，面對缺工問題，「法律與公正黨」無疑陷入一種兩難困境。緊縮勞工市場的結果，可能導致經濟成長趨緩；但引進勞工的結果，卻不符合執政黨的反難民（移民）立場。為了避免產生負面政治效應，「法律與公正黨」對外公開的優先政策選擇，不是引入外籍勞工或收容難民，而是提高生育率和吸引海外波蘭移民返國就業；但從結果來看，此二種方案似乎皆未能迅速滿足當前勞動市場的需求。就前者而言，姑不論提高生育率策略是否奏效，很顯然地，從生育率提升落實至勞動就業人口，絕非一個短期可以實現的目標；至於，就後者而言，波蘭政府雖推出「波蘭卡」（Polish Card/Karta Polaka）試圖吸引海外移民（後述），但似乎成效也不夠顯著。因為對於很多海外移民而言，他們還是認為波蘭國內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仍然不夠優渥，同時，社會氣氛也較為保守封閉（Santora 2019）。

事實上，為了因應加入歐盟之後的人口外移，在「法律與公正黨」首次執政時期（2006年），便已推動多項促進勞動市場的舉措，鬆綁外籍勞工，允許三種特定類別和臨時外勞：一、低技術產業勞動部門（主要鎖定六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包括：白俄羅斯、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亞美尼亞和喬治亞。此六國公民無須工作許可即可進入）；二、特定領域畢業之外籍大學生，

亦可比照波蘭國民之就業條件；三、「波蘭卡」允許海外波蘭籍人士取得長期簽證，可以合法工作而不需要工作許可，並免費享有波蘭教育資源（Frelak 2017）；不過，近年開始，來自鄰國烏克蘭的外籍勞工，儼然已經成為波蘭最重要的勞力市場，特別是在烏克蘭爆發內戰之後。根據估計，目前波蘭境內已經約有超過二百萬烏克蘭勞工（Santora 2019; Tilles 2018; Eurostat 2016; 2018）。

在此，值得思考的問題有二：首先，大量引入烏克蘭外籍勞工，就可以充分解決當前波蘭的缺工問題嗎？短期而言，烏克蘭勞工的湧入，的確緩解不少缺工的現況；但若就長期而言，由於歐盟已經開放烏克蘭簽證，加上相鄰的德國不僅同樣具有勞動力短缺問題，勞動和生活條件也遠遠優於波蘭。在磁吸效應的影響之下，波蘭似乎很難長久留住烏克蘭外籍勞工。正因如此，波蘭政府也已經開始將目光延伸至東南亞和南亞地區。²⁵其次，大量移民湧入國境經常為接受國帶來民怨與融合問題，但為何波蘭在堅拒穆斯林難民的同時，卻敞開雙臂歡迎烏克蘭外籍勞工呢？難道烏克蘭移工不會帶來文化和安全威脅嗎？

我們可以看到，面對西方主流媒體對於波蘭「雙重標準」（拒絕收容穆斯林難民，卻接受烏克蘭難民並積極招募烏克蘭移工）的口誅筆伐，「法律與公正黨」也著重從以下三個論點強硬回擊各方抨擊（Oppressed Media 2018）：

第一個論點，就是強調作為民選政府的責任：晚近各大民調數據清楚顯示，波蘭公眾對於穆斯林難民的反對和疑慮日益加劇，「法律與公正黨」也係以拒絕穆斯林難民作為主要政見而登台。因此，作為一個負責的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自然必須回應選民託付落實政見。同樣，由於波蘭公眾普遍對於烏克蘭難民接受程度較高，咸認波蘭與烏克蘭擁有較高的文化同質性。因此，為了伸手援助鄰國斯拉夫兄弟，並因應國內缺工問題，「法律與公正黨」選擇優先接納烏克蘭難民和移工。

第二個論點，則是強調重彈文化「差異」和「威脅」，強調文化異質性甚

²⁵ 除了佔據多數的烏克蘭外籍勞工之外，波蘭各大城市的街頭，也開始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來自東南亞和南亞的外籍勞工。事實上，波蘭政府正在研擬新的移民政策，企圖鬆綁非歐盟移民定居和工作的門檻，從目前開放的六個前蘇聯國家拓展到東南亞國家，像是越南、菲律賓、孟加拉、印度（Tilles 2018）。

高的穆斯林難民，不僅難以整合並融入波蘭社會，反而會帶來文化侵蝕與恐怖主義的威脅。爲了強化此種論調的基礎，「法律與公正黨」也在宣傳過程中不斷強調和凸顯「波蘭乃是『唯一』從未出現恐怖攻擊的歐陸國家」，並將此歸功於保持文化同質性和拒絕穆斯林入侵。

第三個論點，則是認爲作爲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波蘭有權自己定義「非法移民」和國境規制標準，歐盟無權干預和介入。基此，由於今日的穆斯林難民被定調爲潛藏經濟動機的非合法入境者（相較經過合法程序引入的烏克蘭移工，以及飽受東部戰火波及而湧入的烏克蘭難民），「法律與公正黨」自認擁有充分的理由拒絕收容任何穆斯林難民。

姑不論西方主流媒體是否接受此種回應立場；但毫無疑問，今日，在「法律與公正黨」強力宣傳之下，這種強力回應西方批判立場的論點，無疑早已在波蘭國內公共論述中佔據主流地位；唯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是，此種回應論調是否真能反映波蘭社會的共識？抑或，只是一種政治右翼虛構的真實？此種主流論述廣爲流傳的背後，又體現出何種波蘭的現況處境？在下文的討論中，本文便將進一步對此予以剖析。

針對第一個論點而言，我們可以看到，若以波蘭知名「公共民意研究中心」（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CBOS）統計數據爲例，當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初期，儘管，波蘭公眾確實普遍對於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難民存有較高疑慮（53%反對；33%贊成），而對於烏克蘭難民較有好感（35%反對；56%贊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系列政治右翼的宣傳和操作之下，反對接收穆斯林難民的比重也自此一路飆升，2018年反對接收穆斯林難民的比例，已經高達72%（其中46%，更爲強烈反對）（CBOS 2018）。由此觀之，本文認爲，囿於特殊宗教文化和歷史苦難經驗的波蘭，雖然容易戒慎恐懼外來威脅，但卻是在激烈的移民政治和政黨競爭之下，使得穆斯林難民不斷遭受放大檢視，從而，淪爲公眾恐懼的焦點（相較之下，波蘭公眾雖然起初對於烏克蘭難民也存在一定比例的反對聲音，但由於並未成爲移民政治和政黨競爭的焦點，再加上政治右翼不斷強調烏克蘭難民同爲「斯拉夫兄弟」、分享「基督教信仰」並皆爲「俄羅斯霸權受害者」，遂使得公眾反對之聲始終居於弱勢）。

事實上，另一項「公共民意研究中心」在2015年進行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其實只有12%波蘭民衆曾經接觸穆斯林（很多波蘭民衆還是因為出國旅行，才有機會接觸穆斯林）（CBOS 2015）。換句話說，極度缺乏深刻認識的結果，不僅為政治右翼創造極佳的話語空間，也使得波蘭公衆在激烈的政治競爭之下，很容易接受公共輿論中的刻板印象宣傳（同理，我們也能合理解釋，為何1990年代的車臣穆斯林難民並未引起軒然大波？因為當時波蘭政治的焦點，皆擺在政治轉型和經濟自由化相關問題，根本缺乏今日移民政治的背景）。

針對第二個論點而言，必須先指出的是，波蘭右翼雖然經常宣稱，因為不像西歐國家一樣接受穆斯林，使得波蘭成為「唯一」未曾出現恐怖攻擊的歐陸國家（Applebaum 2018）。同時，右翼社群網站中，也廣泛流傳許多形象各異的歐盟「恐怖主義分佈點狀圖」，將波蘭刻意標識為歐陸「唯一」置身恐怖攻擊之外的國家；然而，根據「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數據顯示，2001年至2014年，波蘭雖然確實未曾出現有記錄的恐怖攻擊事件（資料庫統計對象包括各類恐怖攻擊），但2016年迄今，波蘭卻曾出現至少4起有記錄的恐怖攻擊事件（儘管，攻擊規模和傷亡較小，主嫌多為反政府或仇外人士，而非公衆擔心的穆斯林恐怖攻擊）；²⁶但很顯然地，為了強化自身反移民（難民）政策的正當性，特別是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前後，波蘭右翼宣傳陣營明顯片段擷取「2001年至2014年」的情況，藉以凸顯接收移民（難民）背後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並刻意忽略2015年之後出現恐怖攻擊的個案。

藉此，波蘭右翼企圖向公衆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亦即，波蘭社會對於同質文化的堅持，毋寧才是消弭恐怖攻擊的真正關鍵。因為，環顧今日全球恐怖攻擊事件，除了少數從境外滲入的勢力之外，絕大多數是「禍起蕭牆」的「本土恐怖主義」（Homegrown Terrorism）。²⁷「世俗主義」和「多元文化論」帶

²⁶ 四起有記錄的恐怖攻擊事件，分別為：一、2018年8月1日（不知名嫌犯朝以色列參訪學生投擲爆裂物；無人傷亡）；二、2017年2月15日（不知名嫌犯在警局安裝爆裂物；無人傷亡）；三、2016年5月23日（無政府主義者試圖在警方車輛安裝爆裂物；無人傷亡）；四、2016年5月19日（個別反移民極端分子在巴士安裝爆裂物；1人受傷）。

²⁷ 關於「本土恐怖主義」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參見王孟平、張世強（2015）。

來的族裔混雜、認同危機和價值崩解，才是西方不斷遭受恐怖攻擊的根源。真正能夠維繫波蘭安全的力量，並不是密不透風的國境管制或嚴苛的反恐法令，²⁸也不是阻止文化同源的斯拉夫兄弟入境波蘭貢獻勞力，而是要頂住西方強大的「政治正確」壓力，堅拒哪些無法認同與同化的穆斯林。

此種立基於文化「差異」和「威脅」之上的論調，看在波蘭中、左派自由派人士眼中，卻被譏諷為是「沒有穆斯林的伊斯蘭恐慌」（Islamophobia without Muslims）（Goździak and Márton 2018）。言下之意，波蘭沒有難民，卻有難民話題。根本尚未入境的穆斯林難民，早已被政治右翼刻意「虛構」為波蘭的最大威脅；然而，面對此種深植選民人心的觀念，中、左派政黨也不敢公然提出擁護難民或移民的訴求。搖擺不定的政治訴求，也使得它們在近年選舉中，始終處於挨打局面。²⁹

²⁸ 2007年簽署《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開放邊界之後，入境波蘭也等於入境歐洲「申根區」（Schengen Area）。除了配合「歐洲刑警組織」（Europol）執行國境管理和跨國犯罪打擊之外，波蘭也透過警察、海關、國境警察、中央反貪局（Central Anti-Corruption Bureau）、金融資訊總檢（General Inspector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和國內安全機構（Internal Security Agency）六個機構，作為共同合作協力執法的國內對應單位。整體而言，波蘭國境管理的機制、分工和執法現況，並無異於其它歐盟國家，也未特別投入預算和重點工作（儘管，晚近波蘭企圖仿效德法奧等國針對特定事件實施臨時性邊界管制，但基本上，面對其它「申根區」國家，波蘭並未實施任何邊界管制）（Soboń and Piertuniak 2019; Schengen Visa Info 2019）。

²⁹ 作為一個長期受到共產統治的國家，波蘭左派政黨和勢力始終有其一定的政治聲量，甚至，先後曾於1993年和2001年二度上台執政；1993年國會選舉乃係波蘭民主轉型之後第二次真正全面性的國會改選，也是針對民主轉型路線檢討的舞台：從經濟轉型模式和範圍的辯論（特別是私有化進程）、社會政策的改革（失業和公部門），再到歐洲一體化參與角色（如何兼顧國內產業保護和接軌市場經濟需求）。最終的選舉結果顯示，先前過於躁進的自由化市場經濟改革，不僅帶來難解的社會適應陣痛和各方對於轉型正義的質疑，也催生公眾「重回舊時美好時光」的緬懷氛圍，讓前共黨改制的中間偏左「民主左翼聯盟」攜手「波蘭農民黨」（Polish Peasants' Party）共組聯合政府。同樣，因為惡化的經濟問題（包括：政府赤字導致縮減社會福利支出，以及選前迅速飆升的失業率），以及失業部門和弱勢小農的強烈聲浪，讓2001年「民主左翼聯盟」攜手「波蘭農民黨」二度登台（Millard 2010）。整體而言，雖然具有波共背景和根源，但晚近波蘭主要左派政黨，早已轉型成溫和社會主義政黨，往往只能從「社會政策」和「道德議題」方面，找出其與右派主流政黨之間的區隔（同樣不敢公然挑戰天主教會的權威地位）。可以說，左派政黨二次上台的主因，皆導因彼時選民對於自由化市場經濟負面效應的不滿。作為主流右派政黨之外的「另一種選擇」，許多選民將希望寄託於左派政黨身上，修正自由化市場經濟力度並強化社會政策；但社

唯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波蘭右翼對於文化「差異」和「威脅」的渲染，固為當前波蘭公眾特別反感穆斯林難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本文認為，此種強烈情緒的背後，毋寧更是一種波蘭社會集體焦慮的投射。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穆斯林難民本身，也不在於穆斯林難民的數量，而在於穆斯林難民已被投射為波蘭社會集體焦慮的「代罪羔羊」（Scapegoat），一種對於今日波蘭路線選擇和定位的不確定和徬徨。因為，穆斯林難民問題的背後，牽涉的不僅是文化「差異」和「威脅」所帶來的融合、治安與宗教認同紛擾，也觸及波蘭對於歐盟整合立場的表達（包括：是否繼續屈從布魯塞爾配合「難民配額」計畫？甚或，利用難民問題作為歐盟內部角力的槓桿？），以及全民對於波蘭未來社會福利、人口問題和發展路線的整體論辯（例如：引入外來人口是否可以作為未來波蘭國家發展的選項？）；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當難民危機逐漸消褪之後，「法律與公正黨」也無法持續訴諸難民威脅的旗幟，必須回應這些「遮蔽」在難民問題背後的集體焦慮（詳見下述）。

針對第三個論點而言，必須先行說明的是，特殊的地緣位置（位居要衝）和歷史經驗（圍困之感），使得波蘭深知，地緣是劣勢，也可以是優勢（得以藉由位居重要門戶角色，獲得許多結盟與合作的機會）。從而，也促使波蘭在此基礎之上，開展三條相互依存與互補的重要軸線，成為冷戰後期波蘭構築國安思維和戰略的基本框架：一、聯美制俄（加入「北約」尋求軍事屏障）；二、鄰國集團（東歐「維謝格拉德集團」）；三、參與歐盟（從2004年開始）。在此基本框架之中，如何維繫主權獨立、民族自決和文化傳統，始終都是波蘭最為關注的核心問題。

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看到，「法律與公正黨」藉由在穆斯林難民問題的強硬表態，一方面，作為未來歐盟內部角力的槓桿；二方面，企圖對內塑造一種重要形象，凸顯該黨乃係捍衛波蘭獨立自主的唯一選擇（大力批判歐盟一直強加「世俗主義」和「多元文化論」，更不斷要求波蘭配合「難民配

會政策並非萬靈丹，左派政黨不僅未能明顯改善彼時孱弱的經濟體質，反而在其它爭議問題上落居下風，而此也正為左派執政二度被拉下台的原因（1997年因為墮胎道德議題受到挫敗；2005年則因為內部弊案醜聞而敗選）。

額計畫」並接受穆斯林難民的判準，早已嚴重侵蝕捍衛主權獨立的最高戰略目標）。然而，持續製造對抗歐盟氛圍的操作，也帶給「法律與公正黨」一個現實上的兩難，特別是當越來越多激進側翼倡議「波蘭脫歐」（Polexit）之說，但主流民意卻顯示願意繼續留在歐盟，享受會員國身份的經濟和發展優勢（Chapman 2020）。

基本上，不同於激進右翼小黨，「法律與公正黨」並不是一個疑歐派或脫歐派政黨，而只是希望從對抗歐盟的議題上加碼，這也是為何該黨支持「歐洲現實主義」（Eurorealism），強調它們反對的不是歐盟，而是歐盟的「政治正確」（Dudzińska and Kotnarowski 2019）！換句話說，除非歐盟跨過三條「紅線」（一、過度親俄、排擠北約，或企圖切斷波蘭與美國的軍事聯繫；二、強行推動接受歐元；三、過度介入內政問題，像是穆斯林難民問題或後文論及之近期爭議事件），不然，考量整體國家安全和發展需求，「法律與公正黨」毋寧仍將會選擇留在歐盟扮演一個「主見日強」的角色，繼續從消費歐盟相關爭議事件中獲益，不太可能真的跟上「英國脫歐」的步伐（Chapman 2020）。畢竟，「法律與公正黨」也深知，相較於歐盟，俄羅斯始終才是波蘭最畏懼的敵人！繼續在歐盟扮演門戶要角，才能為波蘭爭取最大利益。

伍、代結語：「不」自由民主政體？

難民危機暫告消褪之後，為了進一步鞏固執政地位和公共話語權，「法律與公正黨」開始透過國家權力的挹注，繼續延展右翼論述的影響力，並展開一系列重要的動作：

首先，就是重新書寫歷史。為了呼應「圍困」的集體歷史記憶傷痕，「法律與公正黨」上台之後，便重新解構「親共自由派」的歷史詮釋，積極參與歷史的重新書寫。其中，二起爭議事件最具代表性：第一起是「波蘭滅絕（集中）營」爭議（Polish Death（Concentration）Camp Controversy）；第二起則是德國賠償爭議。

長期以來，波蘭右翼一直認為，「波蘭滅絕（集中）營」一詞，經常被西方新聞媒體和公眾人物用來指涉二戰期間德國納粹在波蘭占領區中建造和

運作的集中營，但這卻是一個非常不精準的詞彙。因為，這個詞彙過度著重集中營位於波蘭的地理淵源，不僅非常容易弱化德國人對於「猶太大屠殺」（Holocaust）的責任，甚至，可能造成波蘭參與納粹合謀的公眾誤解，忘記波蘭是比猶太人經歷更多苦難的二戰受害者。

基此，「法律與公正黨」便在2016年推動修法，針對「波蘭滅絕（集中）營」的說法，明定刑事處罰（Santora 2018; Zerofsky 2018）；儘管，該法案排除學術研究、歷史討論和藝術活動之適用，但仍引發極大的爭議，³⁰特別是來自以色列的介入關切（Cohen 2018）。最終，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宣讀波蘭和以色列二國聯合聲明，譴責反猶太主義、反波蘭情緒並反對「波蘭滅絕（集中）營」用語之後（Fulbright 2018）。2018年6月27日，波蘭國會也決定退讓，在最終通過的立法版本中移除原有的刑罰規定。

另一起德國賠償事件爭議，則出現在2019年二戰爆發80週年前後。眾所皆知，1970年12月7日，時任西德總理的勃蘭特（Willy Brandt）華沙猶太區起義紀念碑之前上演舉世震撼的「華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開啓德國與東歐國家和解的序幕；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波蘭在1953年便已自願放棄戰爭賠款，1990年二德統一之後，德國新政府也曾與進行多邊交涉，確認免於後續戰爭賠款問題，波蘭卻在多年之後再度「舊事重提」，要求德國必須賠償8,500億美元。一般認為，此舉背後的政治象徵意涵多於實質利益（正如希臘在與德國商議紓困條件時重提戰爭賠款一樣），真正目的不是戰爭賠款本身，而是著眼於同年年底將要舉行的國會大選，希望藉由共同的歷史仇恨經驗，再度動員波蘭的民族主義（毛開雲 2019）。

其次，就是推動司法和媒體轉型正義。

「法律與公正黨」上台之後，一方面，便伸手介入波蘭唯一、也是涵蓋最為廣泛的頻道和地區公共電視「波蘭電視台」（Telewizja Polska, TVP），

³⁰ 受到此一事件影響，2017年，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也將波蘭媒體評估為「部分自由」（Partly Free），從前一年的「自由」（Free）降級（Freedom House 2017）。

並為媒體從業人員制定嚴格的專法；另一方面，也以司法改革之名，降低法官退休門檻以清除憲法法院（Constitutional Tribunal）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體系中的政敵，並強化國會對於司法違憲審查的反制（Kentish 2019; Davies 2016; Santora and Berendt 2017; Cohen 2018）；儘管，面對各方批評，³¹但「法律與公正黨」提出反駁，認為今日波蘭媒體和司法仍然存在共黨統治餘毒，導致二者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因此必須落實真正的轉型正義（Zerofsky 2018）。

最後，則是「女同、男同、雙性和跨性」（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在此簡稱為「性別運動」）爭議。「法律與公正黨」希望藉此議題打造「波蘭新的敵人」，取代穆斯林難民，特別是在難民危機暫時退出舞台中央之後。

相較於其它歐盟國家，受到天主教文化傳統與價值影響的波蘭，對於性別和家庭問題的立場始終保守，不僅同志婚姻迄今仍屬非法，同性關係也未得到法律承認。根據知名市場調查公司易普索（Ipsos）為波蘭網站進行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受到波蘭右翼論述的影響，「性別運動」不僅被視為一種「外來」文化的入侵，也是「多元文化論」之下的附產品，係為今日波蘭最嚴重的威脅，甚至，遠勝排名居次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Furmaniczuk 2019）；不唯如此，「法律與公正黨」也在選戰競爭中大聲疾呼「放開我們的孩子」！撻伐部分學校依循「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制定的標準進行「性教育」，並堅持學校教育僅能存在「家庭教育」。「性教育」係屬子女家長的憲法權利，學校和非政府組織無權取而代之。基本上，此種立場也呼應波蘭天主教會表達的基本立場（Harper 2019b）。

但事實證明，「性別運動」是一個「一刀兩刃」的議題，「法律與公正黨」並無法完美複製反難民（移民）論述的風潮，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³¹ 作為歐洲議會的諮詢機構並未冷戰後中東歐國家提供憲法諮詢的「威尼斯委員會」（The Venice Commission）便曾對此發展趨勢提出警告（Cohen 2018）。

就是「性別運動」在波蘭社會醞釀多時，已經取得不少的群眾支持基礎。³²此外，由於很多「性別運動」的倡議者和支持者皆為波蘭本地人士，因此，相對弱化其「外來」意識形態的攻訐（Harper 2019b）；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天主教會內部也存在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分歧，很難進行政治動員。因此，強力操作「性別運動」的結果，未必有利於「法律與公正黨」獲得更多政治能量（Cienski and Wanat 2019）。

上開一系列爭議性措施和立場，不僅觸及西方「政治正確」的敏感神經，也引起歐盟的強烈關注，批評波蘭違背《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關於媒體自由（第11條）、難民地位（第18條）與性別歧視（第21條）的保障原則。³³「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更宣稱，將首次啟動《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第7條程序，³⁴因為，波蘭的自由、民主與法治（像是媒體自由、司法獨立和權力分立）皆已受到系統性破壞；但由於會員國停權必須得到全體會員國同意，而匈牙利等國早已表態支持波蘭，因此，二年之後，「歐盟

³² 儘管歐盟多次批評波蘭對於「性別運動」的保守立場和歧視性態度，但該議題始終未能進入主流政治討論視野，直到2011年，由白手起家的富豪帕裡寇特（Janusz Palikot）創立新政黨「你的運動」（Your Movement, TR）之後，由於成功吸走「法律與公正黨」和「公民綱領黨」（以及「民主左翼聯盟」）的支持基礎，該議題才真正正式進入波蘭國內政黨競爭的舞台核心（O'Dwyer and Vermeersch 2016）；儘管「性別運動」成為政治右翼攻擊的箭靶，但根據一項最近由易普索進行的研究調查結果顯示，波蘭民眾對於同性伴侶權益保障的支持，已經上升至56%，對於同性婚姻的支持，也來到41%，雙雙創下新高（Harper 2019b）。未來，波蘭政治右翼是否會繼續主打該議題，非常值得後續觀察。

³³ 波蘭雖然在2007年12月21日簽署《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2009生效），但卻行使《里斯本條約》中的退出權利，在簽署憲章時附帶「排除協定」（Opting-Out Protocol），阻卻憲章在波蘭國內適用。這是波蘭國內政治妥協之下的產物，因為，當時剛上台的「公民綱領黨」為了爭取政治右翼的支持（政治右翼批評此一憲章將會「暗渡陳倉」西方「性別運動」的價值觀），決定對此議題讓步（State Watch 2019）。

³⁴ 《歐洲聯盟條約》作為歐盟法律、治理、政治制度、對外關係和安全政策的基本法，當中第7條規定，倘若歐盟認定成員國持續違反歐盟價值（侵害第2條所列「各個成員國必須尊重人性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少數保障、多元、非歧視、寬容、正義、團結和性別平權」），「歐洲議會」（European Council）可以投票停權成員國，但停權投票需要全體同意，而制裁則僅需要有效多數，會員國則仍然需要遵守條約義務。

委員會」僅以波蘭「存在威脅」作為結論草草收場（Euractiv 2016）。

眼見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很多西方主流媒體便認為，波蘭已經「淪為」一個由右翼民粹勢力牢牢掌控的「不」自由民主政體；但事實上，這種劃分非常容易落入誤區。哈波（Jo Harper）在其編著作品《波蘭的記憶戰爭》（*Poland's Memory Wars*）一書中便曾直指，西方世界對於波蘭的解讀經常陷入三個預設格局：一、經常偏重於特定事件的報導（例如：飛躍的經濟發展），而未能開展全幅視野；二、英美、德法和布魯塞爾，始終在為波蘭設定政治標準，充斥著準殖民語調，並指控波蘭陷入陰謀論和民粹主義；三、西歐媒體輿論總是暗示自己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政體（Harper 2018）。法國知名評論家澤穆爾（Éric Zemmour）也認為，西方媒體經常把歐洲「一分為二」，一邊是擁有民族和多元文化傳統的西歐，一邊則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響並缺乏法治精神的東歐；但近年右翼風潮席捲歐洲的現象，已經充分證明這種劃分的謬誤。因為，許多西歐選民用選票傳達出明確地訊息，他們也非常樂意擁抱被貼上「不」自由民主政體標籤的東歐政治模式（Zerofsky 2018）。

嚴格來說，波蘭的政治光譜不同於西歐。1989年民主轉型之後，波蘭並未真正經歷「左派」（Left）與「右派」（Right）、「自由派」（Liberal）與「保守派」（Conservative）分立的政治光譜，而是像很多東歐國家一樣，屬於一種混合型態（Zarycki 2000; Azmanova 2009; Krzyżanowska and Krzyżanowski 2018）。基本上，政治光譜上的各個東歐主流政黨，幾乎都帶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義色彩（Styczyńska 2018）。儘管，「法律與公正黨」被歸類為右翼政黨，但該黨支持者並非如外界想像，都是本土主義者、鄉巴佬或中低階層；反之，很多都是具有國際觀之雙語菁英（Applebaum 2018）。從前文的討論中可以發現，真正讓該黨不斷獲得波蘭人民擁戴的主因，不是「左與右」或「自由與保守」的立場，而是因為「法律與公正黨」能夠回應波蘭社會對於轉型正義、維繫文化和危機意識的渴望，從而，結合基進側翼政黨的爭議性和煽動性言論，³⁵成功化身恐懼和情感的代言人。

³⁵ 「法律與公正黨」也深知，就不能僅依賴邊緣化政黨。因此，除了小心翼翼地維持與極右派小黨和團體之間「距離美」之外（Kelly and Pawlak 2018），也積極透過慷慨的

近代以降，不是成爲「共產主義」的實驗場所，就是「西方自由主義政體」和「經濟自由化」風潮的追隨者，但波蘭卻同樣在付出高昂代價之後，方能見證二種制度和意識形態背後的弊病。本文認爲，與其「鸚鵡學舌」地依循西方世界的主流觀點，爲其貼上「政治不正確」的負面政治標籤，並生硬地套用西方中心理論的分類視野，複製西方知識霸權的權力網絡。吾人不仿改道而行，真正進入波蘭特殊的政治、歷史與文化脈絡，理解今日波蘭何以出現西方世界無法解釋和見容的政治抉擇，正視波蘭這套「東歐式典範」（西方主流媒體眼中的「不」自由民主政體）政治選擇背後的內在理性。相信，更能幫助吾人從反難民（移民）論述中，窺見當代西方主流政治體制的困境。

（收件：108年11月28日，接受：109年6月11日）

社會政策吸引中間選民（例如：提高養老津貼和最低工資、降低退休年齡、實施更多兒童福利和家庭補助（Harper 2019a; Gocłowski and Florkiewicz 2019）。

From Political Incorrectness to Political Correctness: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Anti-Refugee/Immigration Discourses of Political Right Wings in Poland

Cheng-yi Lin

Ph. D. Candidate

Ph. D. Program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ion, Business Intelligence School,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ng-ping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Poli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Shih-chiang Chang

Ph. D. Sun Yat-s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fall of Communism in 1989, Poland has once been view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among former Eastern bloc nations. In the wake of 2015's refugee crisis, however, a full-outbreak of Poland's political right-wing movement with their radical anti-refugee/immigrant rhetoric, led by 'Law and Justice' (PiS),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ost striking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Europe since WWII's fascism and posed a comprehensive challenge to the modern western system of liberal democracies. From a wider context of Poland's unique politics, culture, and hist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understand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refugee crisis, the radical anti-refugee/immigrant rhetoric, and today's hegemony of Poland's political right-wing, commonly labeled by mainstream media as populist, nationalist or illiberal democratic.

Keywords: Illiberal Democracy, Jarosław Kaczyński, Prawo i Sprawiedliwość (PiS), Refugee Crisis, Visegrád Group (V4)

airiti
參考文獻

- 毛開雲，2019，〈豈有此理！德國再為二戰道歉，波蘭為啥開出8500億美元賠償？〉，<https://kknews.cc/history/344zn2g.html>，查閱時間：2019/10/12。Mao, Kai-Yun. 2019. “Giyou cili! deguo zaiwei erzhan daoqian, Poland weisha kaichu 8500yi meiyuan peichang?” [How Come! Germany Apologized for WWII again. Why Did Poland Ask for Compensation of \$850 Billion?]. (Accessed on October 12, 2019).
- 王孟平、張世強，2015，〈臺灣也有「聖戰士」？國境管理與涉外執法的新挑戰〉，《涉外執法與政策學報》，5：23-43。Wang, Meng-Ping, and Shih-Chiang Chang. 2015. “Taiwan yeyou shengzhanshi? guojing guanli yu shewai zhifa de xintiaozhan” [Jihadist in Taiwan? A New Challenge for Border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Journal of Law Enforcement & Policy Involving Foreign Affairs*, 5: 23-43.
- 陳平，2019，《代謝增長論：技術小波和文明復興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Chen, Ping. 2019. *Daixie zengzhang lun: jishu xiaopo he wenming fuxing lun* [Metabolic Growth Theory: Technology Wavelet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Andreev, Alexander. 2016. “Refugee Crisis: Not the Same Values in East and West.” <https://www.dw.com/en/refugee-crisis-not-the-same-values-in-east-and-west/a-19102868> (August 2, 2019).
- Applebaum, Anne. 2018. “A Warning from Europ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10/poland-polarization/568324> (September 28, 2019).
- Azmanova, Albena. 2009. “1989 and the European Social Model.”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35 (9): 1019-1037.
- BBC. 2015. “Migrant Crisis: EU Ministers Approve Disputed Quota Pla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4329825> (October 17, 2019).

- BBC. 2016. “Migrant Crisis: EU-Turkey Deal Comes into Effect.”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35854413> (October 3, 2019).
- Borowik, Irena. 2017.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Transforming Poland: A Conclusion.” In Sabrina P. Ramet and Irena Borowik, eds., *Religion, Politics, and Values in Pol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Since 1989*. pp. 313-324.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CBOS. 2015. “Postawy wobec Islamu i Muzułmanów.” [On Attitudes toward Islam and Muslims]. https://cbos.pl/SPISKOM.POL/2015/K_037_15.PDF (March 7, 2020).
- CBOS. 2018. “Stosunek Polaków i Czechów do przyjmowania uchodźców.” [The Attitude of Poles and Czechs to Receiving Refugees]. https://cbos.pl/SPISKOM.POL/2018/K_087_18.PDF (March 7, 2020).
- Chapman, Annabelle. 2020. “Poland’s Leadership doesn’t Need ‘Polexit’: It Can Undermine the EU from Withi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commentisfree/2020/mar/10/poland-polexit-eu-rightwing-law-justice-party-judiciary> (March 1, 2020).
- Cichocki, Piotr, and Piotr Jabkowski. 2019. “Immigration Attitudes in the Wake of the 2015 Migration Crisis in the Visegrád Group Countries: Comparative Insights of ESS7 and ESS8.” *Intersections: Eas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ety and Politics*, 5 (1): 27-47.
- Ciensi, Jan. 2015. “Migrants Carry ‘Parasites and Protozoa,’ Warns Polish Opposition Leader.”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migrants-asylum-poland-kaczynski-election> (August 24, 2019).
- Ciensi, Jan, and Wanat, Zosia. 2019. “5 Takeaways from the Polish Election.”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poland-pis-tougher-times-despite-winning-election> (October 16, 2019).
- Cohen, Robin. 2006. *Migration and Its Enemies: Global Capital, Migrant Labour and the Nation-State*.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 Cohen, Roger. 2018. “Awaken, Poland, before It’s Too Late.” <https://www.nytimes.com>

com/2018/02/16/opinion/awaken-poland-before-its-too-late.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Coverage&pgtype=Article®ion=Footer (September 26, 2019).

Davies, Christian. 2016. "The Conspiracy Theorists Who Have Taken Over Poland."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6/conspiracy-theorists-who-have-taken-over-poland> (August 22, 2019).

Day, Matthew. 2019. "Law and Justice Party Wins One of Largest Victories in Poland's Democratic History."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9/10/14/law-justice-party-wins-one-largest-victories-polands-democratic> (October 16, 2019).

Demos. 2017. "Mapp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Rising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Fear in the European Union." <https://www.demos.co.uk/wp-content/uploads/2017/02/Demos-Nothing-to-Fear-but-Fear-Itself-Summary.pdf> (September 1, 2019).

Dudzińska, Agnieszka, and Michał Kotnarowski. 2019. "Imaginary Muslims: How the Polish Right Frames Islam."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imaginary-muslims-how-polands-populists-frame-islam/> (March 5, 2020).

Erlanger, Steven, and Marc Santora. 2018. "Poland's Nationalism Threatens Europe's Values, and Cohesion."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0/world/europe/poland-european-union.html> (August 26, 2019).

Euractiv. 2016. "EU Takes Unprecedented Step against Poland Over Rule of Law."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central-europe/news/eu-takes-unprecedented-step-against-poland-over-rule-of-law> (August 30, 2019).

Eurostat. 2016. "Record Number of Over 1.2 Million First Time Asylum Seekers Registered in 2015."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products-press-releases/-/3-04032016-AP> (September 1, 2019).

Eurostat. 2018. "First Residence Permits Issued in the EU Member States Remain above 3 Million in 2017."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9333446/3-25102018-AP-EN.pdf/3fa5fa53-e076-4a5f->

8bb5-a8075f639167 (September 24, 2019).

Freedom House. 2017.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P_2017_booklet_FINAL_April28.pdf (September 24, 2019).

Freлак, Justyna Segeš. 2017. “Migration Climate, Discourse and Policies in Poland.” <https://www.globsec.org/publications/migration-climate-discourse-policies-poland> (August 30, 2019).

Fulbright, Alexander. 2018. “Netanyahu Takes Credit after Poland Amends Holocaust Law, Says Dispute Now Over.”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poland-resolve-dispute-over-polish-holocaust-law> (August 5, 2019).

Furmanczuk, Robert. 2019. “Polish Police Protect LGBT Marchers as Tensions Rise before Electio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oland-lgbt/polish-police-protect-lgbt-marchers-as-tensions-rise-before-election-idUSKBN1WD0GA> (October 12, 2019).

Gocłowski, Marcin, and Florkiewicz, Paweł. 2019. “Polish PiS Promises Voters Even More Cash Ahead of October Electio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oland-politics-kaczynski/polish-pis-promises-voters-even-more-cash-ahead-of-october-election-idUSKCN1VS06N> (October 1, 2019).

Goździak, Elżbieta M., and Péter Márton. 2018.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Fear of Islam and the Anti-Refugee Rhetoric in Hungary and in Poland.” http://www.ceemr.uw.edu.pl/sites/default/files/Gozdziaak_Marton_Where_the_Wild_Things_Are.pdf (February 24, 2020).

Harper, Jo. 2018. “Introduction: Illiberal, Aliberal, Anti-Liberal.” In Jo Harper, ed., *Poland’s Memory Wars*, pp. 1-22. New York, NY: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Harper, Jo. 2019a. “Poland: Beyond the Pale, Again?”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harper/2019/03/12/poland-beyond-the-pale-again/#761538615a3d> (October 2, 2019).

Harper, Jo. 2019b. “PiS picks LGBT Battleground in Poland.” <https://www>.

forbes.com/sites/joharper/2019/03/24/pis-picks-lgbt-battleground-in-poland/#2c8573042459 (October 2, 2019).

Henley, Jon, and Christian Davies. 2019. "Poland's Populist Law and Justice Party Win Second Term in Pow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oct/14/poland-populist-law-and-justice-party-increases-majority> (October 16, 2019).

Human Right Watch. 2017. "Eroding Checks and Balances: Rule of Law and Human Rights under Attack in Poland." <https://www.hrw.org/report/2017/10/24/eroding-checks-and-balances/rule-law-and-human-rights-under-attack-poland> (August 7, 2019).

Kelly, Lidia, and Justyna Pawlak. 2018. "Poland's Far-Right: Opportunity and Threat for Ruling Pi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oland-politics-farright/polands-far-right-opportunity-and-threat-for-ruling-pis-idUSKBN1ES0BK> (October 1, 2019).

Kentish, Portia. 2019. "Polish Ruling Party Unveils New Policies Ahead of October Election." <https://emerging-europe.com/news/polish-ruling-party-unveils-new-policies-ahead-of-october-election> (October 2, 2019).

Krzyżanowska, Natalia, and Michal Krzyżanowski. 2018. "Crisis and Migration in Poland: Discursive shifts, Anti-Pluralism and the Politicisation of Exclusion." *Sociology*, 52 (3): 612-618.

Millard, Frances. 2010.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Poland, 1991-2007*. New York, NY: Routledge.

Morris, Loveday. 2019. "Europe's Populists Shaken after Elections in Hungary and Poland."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europe/hungarys-populist-leader-orban-handed-election-setback-after-opposition-unites/2019/10/14/b853afe0-ee57-11e9-89eb-ec56cd414732_story.html?arc404=true (October 16, 2019).

Moskwa, Wojciech, and Marek Strzelecki. 2019. "Poland's Nationalists Underwhelmed by Historic Election Win."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9-10-14/the-telling-lukewarm-reaction-to-poland-s-historic>

election-win (October 16, 2019).

- Narkowicz, Kasia, and Konrad Pedziwiatr. 2017. “Why are Polish People So Wrong about Muslims in Their Country?”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can-europe-make-it/why-are-polish-people-so-wrong-about-muslims-in/> (March 12, 2020).
- O’Dwyer, Conor, and Peter Vermeersch. 2016. “From Pride to Politics: Niche-Party Politics and LGBT Rights in Poland.” In Koen Sloopmaeckers, Heleen Touquet and Peter Vermeersch, eds., *The EU Enlargement and Gay Politics*. pp. 123-145.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Oppressed Media. 2018. “STRONK Polish Politician Shocks Leftist Women and the Mainstream Medi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WfpFN4tp4s> (February 26, 2020).
- Panoptykon Foundation. 2016. “Poland Adopted a Controversial Anti-Terrorism Law.” <https://en.panoptykon.org/articles/poland-adopted-controversial-anti-terrorism-law> (August 5, 2019).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 “Europeans Fear Wave of Refugees will Mean More Terrorism, Fewer Jobs.”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6/07/14095942/Pew-Research-Center-EU-Refugees-and-National-Identity-Report-FINAL-July-11-2016.pdf> (August 22, 2019).
- Santora, Marc. 2018. “Poland’s President Supports Making Some Holocaust Statements a Crime.”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06/world/europe/poland-holocaust-law.html> (August 26, 2019).
- Santora, Marc. 2019. “Poland Bashes Immigrants, but Quietly Takes Christian On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03/26/world/europe/immigration-poland-ukraine-christian.html> (September 13, 2019).
- Santora, Marc, and Joanna Berendt. 2017. “Poland Overhauls Courts, and Critics See Retreat from Democracy.”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20/world/europe/eu-poland-law.html?module=inline> (August 26, 2019).
- Schengen Visa Info. 2019. “Poland to Impose Temporary Border Control with

Schengen Area for Mideast Summit.” <https://www.schengenvisainfo.com/news/poland-to-impose-temporary-border-control-with-schengen-area-for-mideast-summit> (September 3, 2019).

Soboń, Andrzej, and Marzena Piertuniak. 2019. “Illegal Immigration as a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Security and Defence Quarterly*, 23 (1): 63-78.

State Watch. 2019. “EU-Poland: Opt-out Protocol to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https://www.statewatch.org/news/2008/jan/01eu-poland.htm> (September 27, 2019).

Steenland, Robert. 2018. “The Visegrad Paradox: Anti-Immigration Parties Need Migrants.” <https://spectator.clingendael.org/en/publication/visegrad-paradox-anti-immigration-parties-need-migrants> (August 26, 2019).

Strzałkowski, Michał. 2018. “Fortress Europe lives on in Poland.”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justice-home-affairs/news/fortress-europe-lives-on-in-poland> (August 1, 2019).

Styczyńska, Natasza. 2018. “Refugees not Welcom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in Poland and the Migration Crisis.” In Karolina Czerska-Shaw, Marcin Galent, and Bożena Gierat-Bieroń, eds., *Visions and Revisions of Europe*. pp. 75-90. Göttingen, Germany: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Tilles, Daniel. 2018. “Poland’s ‘Anti-Immigration’ Government is Overseeing One of Europe’s Biggest Waves of Immigration, but Doesn’t Want to Admit It.”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18/10/03/polands-anti-immigration-government-is-overseeing-one-of-europes-biggest-waves-of-immigration-but-doesnt-want-to-admit-it> (September 26, 2019).

Woźnicki, Łukasz. 2019. “Lawina skarg na paszporty z hasłem ‘Bóg, Honor, Ojczyzna. Adam Bodnar interweniuje w MSWiA’.” [An Avalanche of Complaints about Passports with the Slogan ‘God, Honor, Homeland’ . Adam Bodnar Intervenes in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Administration]. <http://wyborcza.pl/7,75398,24504747,lawina-skarg-na-paszporty-z-haslem-bog->

honor-ojczyzna-adam.html?disableRedirects=true (August 12, 2019).

Zarycki, Tomasz. 2000. "Politics in the Periphery: Political Cleavages in Poland in Historical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Europe-Asia Studies*, 52 (5): 851-873.

Zerofsky, Elisabeth. 2018. "Is Poland Retreating from Democracy? A Debate about the Country's Past Has Revealed Sharply Divergent Views of Its Future."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8/07/30/is-poland-retreating-from-democracy> (August 26, 2019).